

消费型社会：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

莫少群

摘 要 “消费型社会”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消费在整个社会制度安排中处于优先地位。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是由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缘于我们长期处在生产型社会阶段，是由生产型社会本身具有的结构性矛盾所致，而破解这些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这不仅是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构建社会和谐必然要求。

关键词 生产型社会；消费型社会；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2)12-0052-07

作者简介 莫少群，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南京 21009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生产分工体系，不仅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生产力，也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这种发展方式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此导致的负面影响也较多。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受制于外国市场，在应对外部危机上缺乏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本质上是为海外市场服务的经济，而非为国内市场服务的经济，因而难以有动力去改善国内的经济结构，培植国内的消费市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国内经济减速、股市低迷、失业人口增加、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政府、学界和企业界都充分认识到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有关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但是，经济转型从来都不是单一进行的，总是与社会转型相辅相成。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形成必须有与之相适

应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转型，以及公共政策的转型。为此，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首先提议建设“消费型社会”^①。但是，有关消费型社会建设的构想目前各方还未形成共识，相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历史发展所展示的逻辑线索，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的任务、要求等角度对为什么要建设消费型社会做一个系统的阐述。

一、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始终是经济规律的最基本要求。人类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取决于社会的生产能力，所有的生产最终都要通过消费才能得以实现。但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又从来不是静止的，总是处在动态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前工业社会，人类生产以农林畜牧业和捕捞业为主，产品交换主要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进行，这个阶段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消费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11BSH004)的阶段性成果。

的人类社会总体上处于低生产与低消费的平衡状态。随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社会首先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创造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巨大生产力,社会生产迅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人口也大量从农村向城市和工厂集聚。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除了生产技术的提高外,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也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产品利润中的大部分被再投资于新的工厂,而新的工厂又促进了城市地区和其他工业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即“扩大的生产”对应于“扩大的消费需求”。

这种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巨大的生产性消费需求,即不断扩张的生产规模对生产原料和生产工具产生的需求;二是伴随殖民活动而不断开拓的海外市场需求。这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1850—1870年的20年间,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增长了一倍以上,铁的产量翻了两番,世界贸易增长了260%^②。因此,20世纪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国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海外市场不断拓展并驾齐驱的繁荣景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③但在国内,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生活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消费品市场与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

这一阶段的工业社会表现出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的特征,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整个社会制度安排中占有主导地位。从产业结构看,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于生活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冶炼和制造是经济的主导产业,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的研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商品化和专业化还未全面侵入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服务性行业以及家庭生活用品的商品化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面向私人消费的信贷体系^④。从国民财富分配的比例看,生产性积累远大于生活消费,投资需求大于消费需求,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内在动因。从劳动者地位

和劳动力价格看,资本积累制度要求以尽可能低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取尽可能高的剩余价值,以保证生产扩大化的顺利进行和剩余价值再获取。劳动者主要被看作劳动力或生产成本,而不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⑤。从阶级关系上看,国内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分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阵营。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和海外市场的拓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主要目标,相关的社会政策也主要围绕这一目标制定。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西方殖民活动的速度趋减,世界市场也日趋饱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与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国内长期存在的低工资和低消费状况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生产能力,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其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0多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劳资矛盾加剧,罢工和破坏机器的事件此起彼伏。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它宣告了以规模增长为目标的工业社会的终结,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调整以寻求出路。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50、60年代,西方社会在科技、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一些学者将这些变革称之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通过这些调节,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获得了一种新的平衡,同时,传统的工业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因此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在所有的变化之中,除了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重大发展之外,还有四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从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了第三产业为主,从制造业经济转向了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经济。传统的制造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以及工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都持续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它的产值与就业人数逐渐超过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与就业人数的总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对应着社会的各种消费需求,同时也不断开拓

和创造着新的消费需求,使传统的生产主导型经济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经济。

第二,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型,西方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大批的体力劳动者转入非物质生产领域。他们或是从事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服务,如信息产业、金融业、商业,或是从事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服务,如教育、旅游、娱乐、休闲、医疗保健等等。据统计,1970—1991年美国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减少了32.3%,1961—1981年英国减少了35.3%,1976—1989年德国减少了12.3%^⑥。与此同时,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特征的中产阶级的比重迅速上升,并相继在70—80年代末超过了体力工人的数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体,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呈现出“橄榄型”的特征。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当代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社会贫富差距始终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在政治方面,阶级矛盾趋于缓和,蓝领工会逐渐衰落,中产阶级工会与社团组织迅速发展,劳工斗争方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不断增加,促使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服务,从而推动了消费产业的发展。

第三,劳资关系得到协调和改善,劳动者收入大幅增长,社会消费力大幅提高。这里既有资本主义企业自我调节的因素,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积极干预的结果。就前者而言,早在20世纪初,以福特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就开始认识到经济危机与工人低工资之间的关联,他们首先在消费品生产领域进行了一场管理革命,通过采用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也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它的意义在于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和消费能力,从而为消费品生产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到60年代,汽车、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作为廉价的生活必需品进入了大多数普通家庭,西方社会从此步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对于后者而言,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进行了弥补。美国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代表,其核心内容就是调控经济以增加就业,用国家

的力量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以缓解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还从法律上保护劳工权利,制定了最低工资规定以及工资增长制度,并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政策层面奠定了消费主导型经济的社会基础。

第四,资本向日常生活领域发生了全面拓展,使得商品生产模式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促进了消费产业的全面发展。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如娱乐、休闲、健康、教育、信息消费等等,都被纳入到商品生产和服务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发生了有机的嫁接,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述的变化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它们共同创造了全新的消费市场,也塑造了西方消费型社会的面貌。这里所说的消费型社会与生产型社会相对应,是指消费在整个社会制度安排中处于优先地位,并主导着生产。在经济层面上,形成了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业)为主体的,以产品创新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了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以看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两者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这种转型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由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消费激发生产,生产满足消费,新的消费又激发新的生产,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螺旋上升的运动规律。从历史上来看,工业革命的动力首先在于世界市场扩大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当时的科技和政治条件则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但是当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临界现象,需要有新的消费需求来引导产业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种新的消费需求主要不是依赖世界市场扩大,而是依靠社会、文化层面所形成的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机制,其结果就是社会结构发生转型,而社会结构的转型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转型,两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是内在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逻

辑过程之中。

二、建设消费型社会不仅是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期要求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国已经一跃成为制造业产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余额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二、GDP 世界第二的生产大国。但是,这种快速增长依循了西方国家 18、19 世纪工业化的演进路径,也就是实体经济规模急剧扩大以及对外贸易大幅增长。国内庞大的实体经济很大一部分对应于国外的消费需求,是依靠不断增加的投资和出口获得支撑。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中,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旦外部需求减少,国内就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表面上看,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和缺陷所致。它既是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也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同时更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结果。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如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低成本发展战略、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等,这些分析也相应地从不同角度指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但是,从更高的层面看,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缘于我们长期处在生产型社会阶段,是由生产型社会本身具有的结构性矛盾所致。正如前文所言,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尤其是工业制造规模是生产型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它必然造成“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结果,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是国民财富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所占比例较低,社会难以形成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社会发展也就必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产生制度性断裂现象。

为什么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生产型社会状态?这可以从建国以来的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当时为了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赶超英美,国家采用社会管制的方式实施了强制性的高积累、高投资政策,这种发

展战略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全民低消费为条件的,其结果是保证了经济落后条件下重工业体系的优先快速发展,同时也形成和加深了城乡社会的二元隔绝。但计划经济时期工业生产的扩张并没有导致生产过剩,相反,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品依然短缺,整个经济处于一种“高投资,低产出,低收入,低消费”的状况。因而,可以将计划经济社会理解为特殊政治体制下的生产型社会。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以来。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经济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成为为经济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工业品的主要基地。产业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投资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其中加工贸易的比例又偏重,由于两头在外(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其产品的利润一直较低。只有依靠不断追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才能保持增长,因而形成了“高投资——高出口——高投资”的循环路径,其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情况非常类似,这就是“扩大的投资+扩大的外部市场需求”。

客观地说,生产型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无论是欧美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等,都充分说明了,没有工业的长足发展,没有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就无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社会结构也无从谈起。现在的问题在于,生产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自身隐含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缺陷就会显露出来,并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里既包括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包括由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社会发展方式问题。就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投资需求与国内消费需求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并进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概括地说,就是过度的投资需求挤压了国内的消费需求。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投资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2003 年以后一直都保持在 40% 以上。居民消费率则从 2000 年的 46.44% 下降到目前的 35%,而同期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居民消

费率大多在60%以上,欧美发达国家达到或超过80%^⑦。由于缺少消费的拉动,国内的需求结构难以得到改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受到制约,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就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国内需求不足以及需求结构的落后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二,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导致了社会消费力的整体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出现了问题。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劳动力价格优势是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一定时期内发展所需付出的代价,但也只能是阶段性和权宜性的,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在于消费需求,劳动力价格长期过低会抑制社会的消费力,也影响到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从而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以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达到了60%)等问题就是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的消极后果。由于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出口;出口的增加推动了生产性投资的扩大,又进一步挤压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了“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⑧。

第三,长期存在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重经济,轻社会,重效率,轻公平”发展取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在“经济建设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下,GDP增长成为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目标,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出现了短板效应,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一方面,社会发展支出远低于经济建设投资。从“五五计划”一直到2002年,社会发展支出占GDP的比例基本都保持在4%—5%左右,最高时的2002年也不超过6%。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平均保持在1:13左右,经济建设的投资规模远远超出社会发展支出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不协调的状态^⑨。尽管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但社会建设并没有同步前进,相反造成了许多“欠账”,也导致了居民就业难、收入

低、房价高、看病贵、保障弱等一系列难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制度建设上,过于强调效率优先,导致了大量的社会不公,突出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体制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例偏低,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再分配领域,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阻力重重。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二元结构,又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其结果就是造成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我国社会当前仍具有“金字塔”型结构特征,低收入人数庞大,中等收入者占人口比例较低,妨碍了国内消费水平的升级与消费结构的转型,造成内需增长不振。

因此,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在于尽快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这里涉及到对消费型社会的理解问题。国内有不少研究者谈到了建设消费型社会的问题,但大多从如何刺激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讨论相关对策。这样思考固然很有现实针对性,但也容易对消费型社会进行片面化的理解。无论是构建消费型社会还是拉动内需,都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政策层面上。从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可以看出,消费型社会不仅仅指社会有持续增长的消费力,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系统。除了经济层面上,以知识创新和服务为基础的第三产业构成了经济的主体外,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面上,以专业化、职业化为特征的中产阶层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形成了知识密集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在制度层面上,工资增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社会政策的主体,民主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其核心。这个系统超越了生产型社会的缺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级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消费型社会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不仅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实现由生产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型社会的发展思路,加强社会建设,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消费型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应该在于社会结构相对合理、收入

分配相对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其实质在于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其外在表现就是大众消费的繁荣。所以,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还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发展目标来看,都必须把消费型社会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

三、建设消费型社会是改善和保障民生、构建社会和谐必然要求

民生问题是中国现阶段的核心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不公。民生问题在收入、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均有所反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主要缘于中国长期存在的生产型社会体制。如前所述,生产型社会是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劳动者主要被看作劳动力或生产成本,而不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来看,既然劳动者工资是生产成本,那么,它就必须尽可能压低,而维持一个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就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⑩。因此,尽可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增加利润成为生产型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必然造成资本的单向度积累,以及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其结果就是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社会不公程度不断加深,民生问题也因此而生。由于生产型社会不重视解决社会的民生问题,大众的消费能力必然会落后于社会的生产能力,一旦外部产品市场出现饱和,就会导致生产过剩性危机,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会进一步加重民生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和保障民生,就必须改革现存的生产型社会体制,实现从生产型社会体制向消费型社会体制的转型。

这种转型的实质在于从精英消费转变为大众消费。精英消费永远是少数人的消费,是以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大众消费则是大多数人的消费,是以社会财富为大多数人所拥有为条件的,通俗地说,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有钱可以花”、“有钱敢于花”。显然,要实现大众消费的繁荣,民生保障是首要的条件和必需的基础。只有在民生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社会大众才有能力和有信心消费,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主导功能才能实现。同样,只有转变生产主义发展思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和保障民生。

我们以美国为例进一步考察消费型社会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美国的大众消费发端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福特主义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制度,更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改革思路,即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与经济增长内在地联系起来。用福特本人的话说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资,把由于工作效率提高而产生的利润让大家分享,其结果就是员工生活富裕之后,社会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产品的销量也就相应提高^⑪。福特的这一思想是美国社会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的关键,并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新的阐发。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他甚至认为,社会保险应该负责公民“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⑫。为此,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法》等法规,有效地解决了劳动者低工资、低消费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改善和保障了民生。这些措施对于减少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扩大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学家卡图纳对此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今天在这个国家里,对大多数人而言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标准有了保障。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从前的奢侈品如拥有私房、耐用品、旅游、休闲和娱乐不再限定在少数人身上了。芸芸大众都参与到享受这些物品的行列,并表现出对这些物品的最大的需求。”^⑬更重要的是,伴随民生问题的改善,美国社会的“大众”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居于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不断缩小,收入相对平稳的中间阶层一直呈扩大态势,大众消费逐渐地主要指这个阶层的消费行为。显然,在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少数有钱人所带动的消费远低于“橄榄”型社会里中产阶级所带动的消费。

另外,从民生的角度看,美国的大众消费还体现了一种平等消费,即承认普通公众都有享受的权利,比如在拥有汽车方面,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平等地拥有廉价而耐用的汽车。为此,社会不但要生产出高质低价、适销对路的产品,还要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注重利用种种手段(如分期付款)来帮助人们实现消费愿望。这种消费权利的平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此,无论从目标看,还是从实现的途径看,消费型社会与改善和保障民生之间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给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即通过制度调整和社会改革,构建消费型社会。为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挥好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健全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社会保障安全网。就当前而言,实施社会保护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解决劳动力价格过低的问题,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尤其要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劳动政策范围,让他们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权益方面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待遇,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主体。二是防范利益调整过程中对中产阶层利益的损害。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很小,也很脆弱,但一般说来中产阶层又是社会消费力提升的引导者。因此,在财税体制改革、财产权保护等多方面要形成一套保护中产阶层的机制,以充分激发他们的消费力。有了这些措施,我们才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当前我们正处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拐点。依靠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仅仅靠刺激消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需的形成,靠的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具备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消费能力。只有“民富”甚于“国

富”,社会阶层结构才能得到改善,社会整体的消费购买力才能得到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型才会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近期的一些经济动态表明,西方国家开始调整政策,注重发展本国实体经济来解决就业问题,国际资本也出现了回流的迹象,可以预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会不断地加剧,这些都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制约。中国国内实体经济对应于外部市场需求的时代可能将一去不复返,剩下的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过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转型,以及公共政策的转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型社会。

注:

- ①郑永年《出口导向型已走到尽头 中国须建内需型消费社会》,《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2月23日。
- ②【美】托马斯·K·麦克劳《资本主义世纪》,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 ④【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0页。
- ⑤王宁《中国何以未能走向消费型社会》,《社会》2009年第2期。
- ⑥吴浩《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⑦余斌《扩大消费需求“十二五”的一项战略任务》,《政策瞭望》2010年第12期。
- ⑧孙立平《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1日。
- ⑨王树同、赵振军《从流量到存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经济福利问题》,《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 ⑩王宁《中国何以未能走向消费型社会》,《社会》2009年第2期。
- ⑪刘晓君《福特制的百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3期。
- ⑫李昀《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物》2007年第2期。
- ⑬George Katona, 1964, Mass Consumption Society.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pp. 5-6.

(责任编辑:秦 川)

(下转第71页)